

# 清代普洱府贡茶的品种和皇室风尚

——普洱府贡茶缘由考(上)

清代普洱茶作为皇朝贡品,起始于何年有待进一步考证,据史料记载,至迟在清雍正四年(1726年)鄂尔泰在云南推行“改土归流”时期,应已每年向朝廷进献(岁贡)。北京茶叶专家王郁风先生对普洱贡茶做过考证研究,他曾于1993年4月在思茅举行的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交流研究成果。本文现从“贡茶品种”“贡茶受宠”“贡茶采办”“贡茶国礼”“贡茶影响”等方面,据笔者所知分述之。



记载了普洱贡茶的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》

## 普洱府贡茶品种

清代雍正年间以来,宫廷将普洱茶列为贡茶,视为朝廷进贡珍品。清乾隆六十年(1795年),规定普洱府上贡茶4种:团茶、芽茶、茶膏和饼茶。其后,清政府又规定,贡茶由思茅厅置办。清《普洱府志》卷十九载,每年贡茶为4种:团茶(5斤重团茶、3斤重团茶、1斤重团茶、4两重团茶、1.5两重团茶)、瓶盛芽茶、蕊茶、匡盛茶膏共八色。另外,作为贡茶的还有景谷民乐秧塔白茶,即“白龙须贡茶”和墨江的“须立贡茶”。

思普区(今称普洱市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,在唐南诏时称银生节度地)的茶叶,唐宋以来销往西藏。清《普洱府志》载:“普洱古属银生府,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。”唐代以后历代皇朝常用云南普洱茶同吐蕃交换马匹,即“茶马贸易”,茶名可能当时称“银生茶”。茶马贸易使云南普洱茶有了稳定的销路,需求增多,从而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,逐渐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普洱府六大茶山,声誉远播。明代万历年间,谢肇淛在《滇略》中,第一次提到“土庶所用,皆普茶也,蒸而成团”。“普茶”即“普洱茶”,此后各种史料亦见有普洱茶名记载。

清雍正四年(1726年),云贵总督鄂尔泰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“改土归流”的统治政策,废土司,设官府,置流官,驻军队,加强行政统治。雍正七年(1729年)设置“普洱府”治,雍正十三年(1735年)十月,设“思茅厅”,辖车里、六顺、倚邦、易武、勐腊、勐遮、勐阿、勐觉、橄榄坝9土司及攸乐土目共8勐地方,裁思茅通判,攸乐同知移往思茅,改称思茅同知,六大茶山均在思茅厅辖区内。于是普洱府的思茅厅成了六大茶山茶叶购销集散中心,集市贸易十分繁荣。同年,奏经朝廷批准征收茶捐,《大清会典事例》称:“雍正十三年题准,云南商贩茶,系每七团为一筒,重四十九两(折合现在的3.6市斤),征收税银一分,每百筋(即斤)给一引,应以茶三十二筒为一引(折合现在的105.2市斤),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。于十三年为始,颁给茶引(执照)三千(折合现今3582担)颁发各商,行销办课(税收),作为定额造册题销。”

清政府为进一步控制普洱茶的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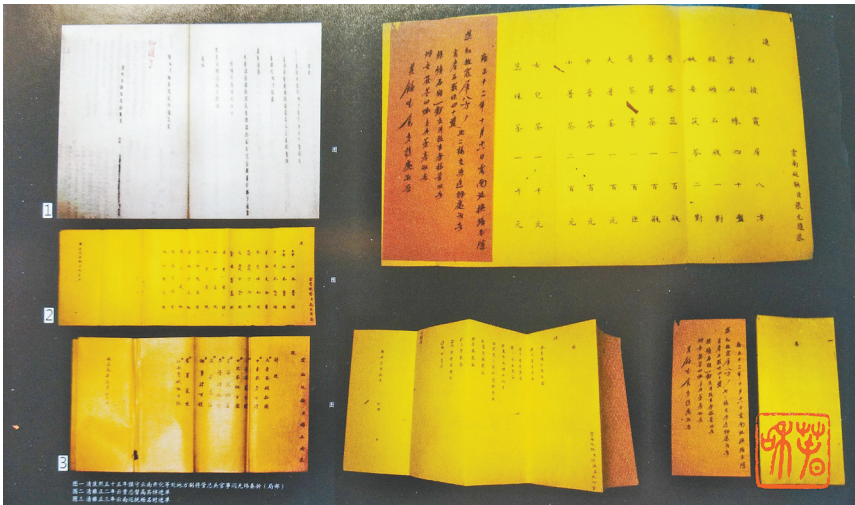
□ 黄桂枢



清光绪年间普洱贡茶



清光绪年间的普洱金瓜贡茶



清康熙、雍正年间的普洱贡茶奏折

销,鄂尔泰总督于雍正七年(1729年)即在思茅设立官办的茶叶总店,指派“通判”官员亲自掌管总茶店,推行变相的茶叶统购专卖政策,不许私自买卖,以独壑其利,同时推行岁进上用茶芽制,选取最好的普洱茶进贡北京,以图博得皇上欢心,岁岁如此。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“按例恭进”的贡茶有:普洱小茶400圆,普洱女儿茶、蕊茶各100圆,普洱芽茶、蕊茶各100瓶,普洱茶膏100盒。故精制上的好的普洱茶珍品即成了岁进皇宫的贡茶,普洱茶之名也因是贡茶而在海内外享有更高声誉。

## 普洱府贡茶受宠缘由

普洱茶作为贡茶进入北京清宫,皇室成员都要品尝,经过与各地送来的贡茶比较,发现普洱茶茶味与茶性都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小叶种茶,因而深得皇室青睐。究其原因,在于普洱茶是深山老林原始大森林中的云南大叶种茶,具有茶味特别浓厚的特殊品质,帮助消化的功力最强,并有治疗、保健的作用。普洱茶的这些特性,明清时代的人士早有体验,并有多种文字记载。明代崇祯进士、懂医学的学者方以智在《物理小识》中

写道:“普洱茶蒸之成团,西蕃市之,最能化物。”清乾隆年间学者赵学敏在《本草纲目拾遗》中云:普洱茶“味苦性烈。解油腻牛羊毒,虚人禁用。苦涩。逐痰下气。刮肠通泄……普洱茶膏黑如漆,醒酒第一,绿色者更佳,消食化痰,清胃生津,功力尤大也。”在该书卷六《木部》又云:“普洱茶膏能治百病,如肚胀、受寒,用姜汤发散,出汗即愈。口破喉痹,受热疼痛,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。”《思茅厅采访》云:普洱茶“帮助消化,驱寒寒冷,有解毒作用”。普洱茶的这些茶性,非常适合清宫贵族们的生活需要,因而使普洱茶成为皇室饮茶首选。

## 清代皇室饮用普洱茶的风尚

清皇朝祖先是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,饮食结构中肉食占比较大,进入北京成为帝王贵族后,养尊处优,珍馐佳肴无所不及,因此需要一种消化功力大的茶叶饮料。而普洱茶正好具有这种特性,于是上贡的普洱茶、女儿茶、普洱茶膏,深得帝王、后妃及贵族的特别赏识。宫中以饮普洱茶为时尚,有用于泡饮的,有用于熬奶茶的,尤其每年冬季北方气候干燥,例须多

# 袁嘉谷对王国维的纪念

□ 陈梦云

## 文史随笔

1927年6月2日,著名学者王国维自沉于北京昆明湖。作为民国近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,他的英年早逝,让人深感痛惜。王国维的离世,是一个难解的文化之谜,也仿佛是一个王朝远去的背影。

王国维逝世后,各种悼念和纪念活动也随之开展,其中最值得一提是的是,1928年,清华大学为王国维先生立“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”,此碑由陈寅恪撰文,林志钧书丹,马衡篆额,梁思成设计。而在这些纪念活动里,作为王国维先生早年曾任职的学部编译图书局的领导、同事和朋友的云南文化先贤袁嘉谷先生,曾撰写文章、进行演讲,追思、介绍、纪念王国维先生。

袁嘉谷在王国维逝世后的第一年,撰《王静安国维别传》,介绍了王国维早年在学部编译图书局工作、读书之简况及创作“暑假歌”的情况。袁嘉谷何以要作此别传?从传中可见,他写这篇文章的主要动机,是释放心中的悲恸:“静安死矣!静安不得其死矣!愚悲之。愚见南北人士悲静安者,各作静安传,尤悲之。”“各传中叙静安事,独于在局日略焉(笔者按,在局日,指王国维早年即1906~1908年,在学部编译图书局工作、生活和研究的3年,此期间,袁嘉谷任局长,王国维任职员)。愚仿东方朔钟离意,赵云别传之意,详人所略,且以释愚之悲。”可见,纪录和介绍王国维在编译局的情况,以“释愚之悲”,是这篇文章的主旨。

1928年6月27日,王国维逝世一周年纪念日,袁嘉谷在东陆大学作了《我在学部图书局所遇之王静安》的授课,其实是学术演讲(笔者按,此演讲,为云南大学成立初期的学术演讲,还尚未受到云南大学校史研究者的较多关注)。在这个演讲里,袁嘉谷根据其撰《王静安国维别传》的认识、思考以及自己对王国维的了解,对主讲此题的缘故,与王国维早年的交往、感情和王国维早年轶事等作了进一步的阐发。

袁嘉谷何以要如此不遗余力、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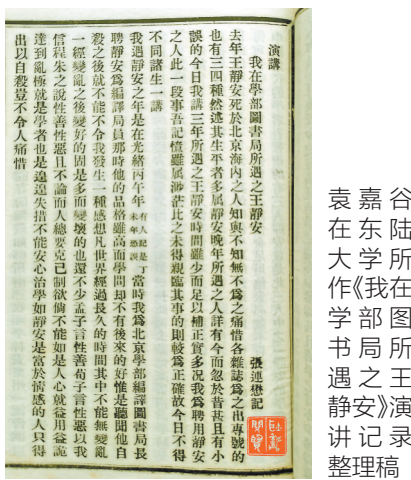


清华大学校园内的“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” 耿嘉 摄

忱纪念和追悼王国维,这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文化意愿和价值追求呢?而且以王国维当时在中国乃至世界学界的名声威望而言,袁嘉谷反复强调他和王国维的交往和关系,极容易让人产生挂靠名人以自抬身价的嫌疑和错觉。而袁嘉谷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为之,这背后,认真想来,窃以为,其实凝聚和折射的恰恰是袁嘉谷作为一位大学者、大教育家独到的远见卓识和情怀。

其一、认真审视袁嘉谷所作之传和学术演讲,我们不难知道,这里面蕴藏的是作为一个大学者求真务实的“史家意识”。唯有这种求真务实,才会让他在面对全国“南北各作静安传……各传中

叙静安事,独于在局日略焉”的残缺和不足时,有意要去做“详人所略”补阙拾遗的学术传记工作,才会去面对“去年王静安死于北京,海内之人,知与不知,无不为之痛惜。各杂志为之出专号的也有三四种,然述其生平者,多属静安晚年所遇之人,详有今而忽于昔,甚且有小误的。今日我讲三年所遇之王静安,时间虽少,而足以补正实多,况我为聘用静安之人。此二段事,吾记忆虽属渺茫,比之未得亲临其事的、则较为正确,故今日不得不同诸生一讲。”袁嘉谷先生希望用自己的亲历、亲眼、亲见,来补正当时报纸杂志纪念王国维时出现的“详有今而忽于昔,甚且有小误”之不足和缺憾,为后来者研究和关注王国维早



袁嘉谷在东陆大学所作《我在学部图书局所遇之王静安》演讲记录整理稿

年的工作、学术、交往和心态等提供可信的“文史资料”,其价值和意义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

其二、袁嘉谷先生不仅对学生作学术演讲,而且还根据学生笔记对讲稿草书进行校订,然后编印成讲义分发给学生学习。袁嘉谷作为学术名家,深知王国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,所以他才会在演讲里反复强调“中国近代的学者,吾推崇的有三人,静安就是此三人中之一。静安的学术可谓由旧学中能够得到新发明的。”“静安的学问,从前也好,到民国以后更好。今日看起来,真是伟大而令人奇异也”。更为难得的是,作为一个教育家,袁嘉谷其实深谙王国维及其身上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化、教育资源。以至于他能够自觉地把自已与王国维的交往,作为一个绝佳的教育资源来加以开发、挖掘和利用,激发学生去了解和认识王国维的生平、人格、思想和学术,向他学习,甚至追随王国维的学术道路,树立起远大的学术追求。这种教育实践或者说教育期待,对于提升学生的精神素养和营造良好的学术风气,无疑具有积极意义。1928年的云南大学(时称东陆大学),建校时间并不长,袁嘉谷能够以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宽广的情怀,向学生和友人推介王国维其人其事和学术造诣,对云南大学的学术风气也将产生良好的带动效果。而且,在王国维生前,袁嘉谷就曾向云南大学校长董泽引荐王国维到云大讲学,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,这或许是袁嘉谷个人和云南大学的一种历史遗憾。

在袁嘉谷为纪念王国维所作的别传和学术演讲里,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一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先生的热忱和敬重,让人感动和温暖。从这些文字和话语里,我们能够感受到袁嘉谷先生那种学者、师者的宽阔情怀。

最后作一个交代,文中所引材料,均出自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《袁嘉谷文集》中的《王静安国维别传》和《我在学部图书局所遇之王静安》,特此致谢。

(作者单位:云县文化和旅游局)

## 云岭风物

# 马龙阮家的“父子铨枢”

□ 彭竹兵

曲靖市马龙区过去有一座“父子铨枢”牌坊。清代许日藻编纂的雍正《马龙州志》记载:“‘父子铨枢’立大街中,明崇祯间御赐兵部武选司阮近贤、吏部文选司阮元声。”

据当地老人回忆,该牌坊上书“父子铨枢”四个大字,四字中间有直书的“纶音”二字及其他一些文字,牌坊威严庄重,下部由石头镶嵌,上部为石雕木梁的石木结构。其中有一根长方形木梁,数丈长,上有浮雕及双排石雕小菩萨,在前一后的菩萨中间嵌有两本线装书。《礼记·缙衣》:“王言如丝,其出如纶。”对此,孔颖达注解说:“王言初出,微细如丝,及其出于外,言更渐大,如似纶也。”后世因称帝王诏书为“丝纶”,可谓四海之滨,莫非王土。“纶音”与“丝纶”同义。

农耕社会,耕读传家为重,地方士人常以人口多寡、有无仕宦者、田地是否多等为标准衡量一个家族,如果一个家族人丁兴旺、有做官的、田地也多、口碑好,就会被视为大家族,明清以来,马龙八大家族就包括了阮家。在《马龙州志》中,关于阮氏家人读书做官、热心公益的记载有不少,最荣耀的莫过于阮近贤、阮元声父子。

阮近贤,字兰室,明代万历丙午(1606年)举人,历任江油县令、庐州府同知、南兵部武选司郎中、黔石兵备道,温文尔雅,擅长诗文书。退休以后,移居曲靖府城。1647年3月,孙可望等人攻陷曲靖,举家死难。阮近贤死于自家院子内的洗耳池。题一联于壁曰:“读书眼欲宽千古;生死心无愧两间。”此处“两间”指“天地之间,即人间”。

阮元声,字无声,号霞屿,阮近贤之子,明崇祯戊辰(1628年)进士,与吕大器、史可法等同榜,历任金华府推官、吏部文选司主事、稽勋司员外郎、陕西乡试主考官。《马龙州志》载:“陈继儒序其集,称为‘昌黎传之澹水、眉山、涑水、眉山之阮无声’。其见重一时,可知矣。惜其早夭,未馨闾施”。这段话意思是:当时的大儒、征士陈继儒为《阮史部诗文集》作序,认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把他的文章传给了司马光、苏东坡,而司马光、苏东坡又把他们的文章传给了阮元声。阮元声被当时的人们看重,由此可见一斑。可惜其英年早逝,未能充分施展才华。阮元声作为明末天下有名的才子,著有《刘孝标沈休文合集》(也叫《刘沈合集》)和《金华文征》《金华诗粹》《吕东莱大事记》《霞屿集》《博识续编》《纪古滇说集》(元代张道宗撰、明代阮元声改正)等,文章名重一时。

阮元声以文章名世,那时不少有声望的人家,编纂家谱、文集等,会请他写序言之类。《马龙州志》收录阮元声的文章有《陕西乡试录序》《懒庵说》《重修龙王堂记》《送张顾存南驾部》《冯黄门使周藩》《送史青罗兵垣》《论奢古藤花诗十首次吕东川兄见韵(有引)》《永昌石母旌节歌》《王太夫人祝寿歌》《送丘清泉兄册封德藩》《寄黄石斋太史》《寄韩叔仲太史》《寄裴骏如》《春日饮李卷实石鹤龙洲》《葵树署中独坐》等。“周藩”“德藩”指明代时的周王、德王。史青萝就是史继任,曾任兵部郎中,“兵垣”指兵部,“纶署”指吏部。吕东川即吕大器,与阮元声同年进士。“旭清泉兄”就是给谏阮旭清。韩叔仲就是韩敏,以不光彩手段夺中状元,后辞官回家。《马龙州志》中收录的这些文章可能仅为阮元声全部著作的极少部分而已。

清代曲靖知府宋湘在《马龙州志赋》中写道:“其人则多乔梓连科,棠棣树甲,如瑞麟、瑞凤,弟兄耀同科之盛;南京、北京,父子统铨枢之职。”“乔梓”比喻父子,“连科”指乡试连续考中。阮氏父子先后考中举人,可谓“乔梓连科”。明代有两套朝廷机构并行,北京有六部,南京也有六部,只不过南京六部主要管辖南京直隶地区,相当于今天的江苏、安徽省,南京兵部负责南京地区的守备。“铨枢”的“铨”指铨部,即吏部,“枢”指枢部,即兵部。根据《马龙州志》《马龙州志赋》可以推知,阮近贤任过南京兵部武选司郎中,由庐州府同知升任。这就是“南京、北京,父子统铨枢之职”或“父子铨枢”的真正含义。

因为“父子铨枢”牌坊是阮家父子的牌坊,当地民间也称为“阮家牌坊”。20世纪60年代,“阮家牌坊”被拆毁,牌坊上的线装书也不知所踪。

(作者单位:曲靖市财政局)